

消费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趋势*

——广东省高校文学批评工作者座谈会暨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
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比较文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综述

李凤亮, 孙 琪

(暨南大学中文系, 广东 广州 510632)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072(2005)04-0068-07

进入21世纪的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呈现出一系列崭新的面貌和动向。新的文化现实与学术理念,既给从事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工作者提出了理论挑战,也提供了新的学术机遇。为联合广东全省高校的文学批评力量,总结近年来广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及比较文学研究的实绩与问题,回应当下各种新进的批评理论,进一步扩大广东文学批评在全国的影响,暨南大学中文系与广东省作家协会文学评论委员会、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比较文学专业委员会共同举办的“广东省高校文学批评工作者座谈会暨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文艺理论专业委员会、比较文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于2005年5月13~14日在广州暨南大学举行。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会长管林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饶芃子教授、胡经之教授、蒋述卓教授及来自全省高校、部分文化艺术单位的8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主题为“消费时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现状及趋势”。带着强烈的学科自省意识,与会代表就“消费时代广东文学批评的现状及问题”、“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

设”、“比较文学研究的崭新拓展及未来趋向”、“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等议题展开热烈研讨。

一、消费时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及趋势

何为“消费时代”?中国是否已经进入消费时代?消费时代出现了哪些新的现象,给我们提出了什么新问题?文学的新形态、新样式对文学工作者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这一系列问题都是近年学界探讨的热点。本次会议本着面对新问题、开拓新思路的原则,各抒己见,不仅形成了科学分析问题的氛围,更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各位学者切入的角度及得出的成果都很有创意。

饶芃子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开幕式主题发言中率先指出,本次会议的主题是一个现实性很强的学术论题。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的出现,文学与市场、传媒的关系日益密切,文学语境发生激烈变化。批评不再仅是文本的阐释、审美活动的行踪。面对新出现的复杂文学现象,批评界出现了焦

[收稿日期] 2005-05-30

[作者简介] 李凤亮(1971—),江苏阜宁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批评理论与比较诗学;

孙 琪(1977—),江苏徐州人,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 本文的资料整理,得到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生罗春光、徐凯、杨光洲、卢欣等同学的协助,特此致谢。

虑,批评队伍也有所分化,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态势。为了应对这样的客观存在,对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估计就成为我们要正视和研究的一个问题。其次,从文学研究来说,当今已没人能够摆脱地球村内信息传递的影响,文艺工作者也是如此。因此,中国文学理论研究应具有世界视野和跨文化的意识,在新的文化形势下,对自身民族文学进行重新思考审视。寻找一种更有效地描述中国文化的诗学体系。当今中国文论面临的是对东方诗学话语、特别是中国诗学话语进行一种理论精粹的研究、转换和重构,要挖掘那些“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民族诗学基因,促使其发展。在当代文化语境参照下,现在国内已有学者在对经典文本作现代诠释方面做出了很好的实绩,他们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经验,那就是:本土话语与异域话语相结合,文学文本与田野作业相结合,中心话语与边缘话语相结合。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文学获得的主要成果都在不同方面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转型的新视角。当今世界,科技发达,文化交流密切,文化影响繁多,新的文化现象层出不穷。比较文学学科的个性是开放交流、尊重宽容、前卫超越、互识互补互证,并由此形成学科的文化观念。我们在研究中要走开放交流对话的道路,自觉开展与各民族文化的对话和沟通,实现各民族文化之间的沟通、理解,以“他者”的眼光反观自身文化,以促进本民族的文学研究。

对于这个问题,胡经之教授(深圳大学文学院)则首先从“学问”谈起。他说,学问应该有两种:一种是“死的学问”,一种是“活的学问”。“死的学问”比如传统的西方文论、中国文论研究,不面对当下经验。“活的学问”是把过去的理论作为方法、资料来阐明当下的现实,解决当下的实际问题。过去的语言、方法不是没用,用来阐释、解决问题,才是“活的学问”。消费时代的中国问题很多:一、中国社会处于什么阶段?中国社会是否已经处于消费时代?中国是前现代、现代还是后现代?西方已进入消费时代,我国的广州、深圳等沿海地区也已进入消费时代。对中国现象应作具体分析。二、日常生活的审

美化,其中有一个价值评价的问题,如何引导、怎么研究的问题。我们不能用身体快感、生理快感来代替精神和精神快感,而应强调精神和精神快感。精神快感是超越生理快感和性快感的。三、研究要加强批判性。文学研究不仅要研究物质向度,还要讲究精神向度。要搞“活的学问”,关注当下现实和精神问题。

蒋述卓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认为消费时代的文艺学需要进行自身的调整,放宽视野,与时俱进,作一番新的建构。首先,应澄清文学的基本问题。比如什么是文学的文学性,文学的存在方式、如何看待亚文学现象等等。其次,应弄清文类的变化。如今,叙事文类仍是主流,但内部却发生了分化与变化,影视借文学成为核心媒体,不同的媒体形式反过来又影响到文学的创作方式。再次,要尊重中国经验。理论流通与交流无国界,但理论的产生与再创造却有国别,这就凸显了中国经验的重要。只有尊重中国文学的中国经验,研究中国的真实问题,才能更好地诠释中国文学。第四,要调整观察视角。文艺学关注当代文艺现象,应与时俱进,调整观察问题的视角,如从生产的视点观察文艺现象等;第五,要坚持人文关怀。文学是人学,人文关怀在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21世纪的人文关怀需要更多体现在新人文精神与新理性精神上。

高小康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着重阐述了消费时代文学经典的确立与认识问题。他以《大话西游》为例,指出判断经典与非经典是历史判断的问题,意义是从语境而不是从语言和字面中来的。我们现在对文学批评的观点大都是从法兰克福学派来的,但他们的理论大多是建立在消费和资本主义商业的观点上的,本身就值得怀疑。对于经典的解读方式,有时要脱离文本,如果研究没有历史判断,如果观点立场先行,作为观点、文化号召可以,但作为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则要值得考虑。

金岱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带着强烈的忧思意识指出,文化消费时代的文学创作和批评现状不容乐观。当前评论界观点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影视剧成为文化中心,文学必然

边缘化;另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泛化了,文学边界扩大了,文学批评的功能扩大了。这些现象都说明文学发生了变化。因此,对文学的认识终究要回到“文学何谓”和“文学何为”的问题上。关于文学是什么,他认为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心灵的沟通。文学的质的规定性是知识分子间性。文学失落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个领域:一是大众领域,欲望化写作;另一个是学科内协作,而没在知识分子场域进行。中国知识分子场域在近百年根本没有形成。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完全在商业和意识形态中进行,而没有在知识分子场域内进行。没有知识分子场域,不仅文学不能生存,哲学、艺术、美学也不能生存。因此,文学的发展有待知识分子场域的形成。

徐肖楠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强调消费时代文学研究不能忽视的若干问题。他认为消费时代虽没在中国全面发生,但已日渐逼近。消费成为现代性的标志。要弄清文学与消费的关系,应当注意:1、弄清消费的基本含义,看到消费主义的物质与精神的双重性。2、这种双重性产生了文学与消费的复杂关系,弄清文学与消费的关系就是弄清文学与现实的某种具体关系。3、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就是文学要关怀人类生存。4、文学是诗性化的现实,应该认识到在消费时代追求诗性化文学的难度。5、诗性存在也是一种独立存在。6、弄清日常审美与精神消费的关系,特别注意两者并不等同,也并不相互构成存在的理由。7、不要对消费主义采取简单的抗拒或支持态度。8、注重消费的民族文化性,清醒地看到消费主义在中国发生的独特情景。9、中国消费发生区域层次的不同。10、中国式消费追求可能会消解善恶区分。

王坤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认为当前学理性最强的颠覆性话语是反本质主义。本质主义从学理上讲确实显现出它的局限,现在的学术研究不太可能追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了。我们应追求批评话语的多维空间,依据在于批评家所面对的资源比作家更丰富,因为他们面对的是现实世界和艺术世界的双层资源。

王钦峰教授(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批评我国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实际上是在移用西方理论,没有结合我国现代性实践,没有结合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文学理论忽略了社会主义现代性问题。要反思我国的现代性问题,要从社会学理论角度划分我们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

杨宏海研究员(深圳市文联)从文学实践出发,认为关注底层写作应是批评家的职责所在。他认为底层写作、打工文学真正反映出底层的生活,深受打工群众的欢迎,但却没有得到主流文学批评界的认可。和谐的文学生态,应是经典文学和打工文学同在。由于种种原因,目前打工文学走向泛化。他呼吁批评界和主流作家关注打工文学,从而构建良好的文学生态。

谢有顺(广东省作家协会)结合其自身批评实践指出,20世纪90年代文学面临边缘化、小众化的趋势。文学如果不能回答具体的境遇问题,那可能只是一种自我满足。现在的文学大多离开现实,缺少与现实的对话,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需要承担的是永恒性问题的追问。消费时代的来临,从社会形态或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是不一样的,仅仅关注一些已进入消费时代的大城市,就会简化中国社会以及中国文学的复杂性。消费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例如《上海宝贝》的被禁反而促成卫慧的“国际化”。消费时代的一些元素,如性、金钱成为消费时代的文学符号。许多因素影响文学,消费主义的因素,非文学的因素,这些都让我们考虑到捍卫文学的复杂性。

二、当前文学批评的问题与出路

广东作为中国东南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已经进入消费时代。这一点基本取得了与会学者一致同意。既然消费时代的到来已成事实,学者们就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新的文学现象、问题及其解决的方法上。在这个时代,文学批评何为?文艺学何在?与会学者展开激烈讨论。

谭元亨教授(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从消费时代文学艺术所遭遇的价值和发展问题出发,对市场规律与艺术规律之间所确立

的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在这个被视为前沿的地带出现了不少误区,甚至若干“伪命题”;如果生硬地把市场、消费与文学的兴与衰、誉与毁扯在一起,只会导致一个个伪命题的发生,并陷于其中不可自拔。针对高度市场化的广东文学创作和批评,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文学应当有自己的独立评价系统,作家和批评家应把持住自己,不为“伪命题”乱了方寸。

傅莹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介绍了当今消费时代文学创作中的一股暗流——“奇幻文学”。“奇幻文学”尚无确切定义,但作为电子时代通俗文学的主样式,已发展得相当成熟。“奇幻文学”作品创造一个个自由与秩序并存的魔法世界,其文学语言和虚构笔法赢得了众多青少年读者的青睐。台湾“奇幻文学”的兴盛、国内读者的剧增,可以看出这一文学形态的发展前景,文学评论界应关注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江冰教授(广东商学院人文与传播学院)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阐述了网络传播对当代文学写作的潜在影响。由于网络的出现,文学的神圣性被严重消解;网络实现了文学制约力量的调整,文人力量被削弱,民间力量在壮大;网络为个人化写作的充分拓展铺就了道路,网络写作呈现出类似于“前诗经时代”的自由生长的状态。

张世君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从接受者的角度出发,认为文学/文化批评工作者在研究大众文化消费时,忽略了对极具文化消费能力的未成年中学生群体的重视和引导。鉴于中学生是在图像影视环境中成长的一代,而社会对这个领域的重视却乏善可陈,她提出合理运用市场运作规律,建设未成年人文化消费的影像业工程的大胆构想。由此,高校文学/文化批评工作者可以开展以下的工作:对影像业产业化生产的策划与引导;进行文学与影像产品的互文性研究;配合出版插图本文学名著;编写影像作品读解本;研究文化消费对不同人群的文化影响。

黄柏刚副教授(茂名学院中文系)反思了消费时代文学批评的功能与作用。批评在消费时代的功能与价值变得单一化,似乎只起到了文

学产品促销广告的作用,而它的质检作用、监督作用,它对具有创意的新产品的引导作用,把不知名产品培养成品牌的作用常常被作家和读者所忽略,也常常为从事批评的人自己所忽略。这种批评功能的萎缩与消费时代紧密相关。一是利益驱动,作家、书商都只关心销量,而畅销与否也成了读者衡量作品价值的一个标准,且批评者受自身利益驱使,很难独善其身。二是消费时代意识形态的松动,使人们对于稍为严肃的批评都认为是扣帽子、打棍子,或者就视为商业炒作。因此,他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承担起质检鉴别、市场营销、广告推广的责任,甚至应该抽出精力来打假,为整个文学产品市场的健全、完善、发展提供保障机制。

江锐歆(饶平县文联)集中探讨网络文学,指出网络文学15年的发展历程表明其在当下已成为民间写作得以复兴、人民文学真正繁荣的希望所在;对个体而言,网络文学则最大限度地释放出作者的个性追求和心灵渴望。当然,网络文学繁荣当中也面临和纸质文学同样的问题,如人文精神失落、主体意识模糊、精神内涵肤浅、虚构能力滑落等等。他呼吁理论批评界能够重视这一文学写作的热潮,深入解读网络文学文本,为张扬广东文学出力。

张仁香副教授(肇庆学院中文系)关注的是消费社会的艺术价值评判问题。她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消费社会的价值诉求、艺术家作为价值主体地位的缺失以及追问消费社会的艺术是手段还是目的这三个方面来切入这个问题,指出消费社会下的文学艺术受制于“他者”,艺术成为“他者”的手段,艺术之目的成为“他者”的目的。文学史上有许多大作家曾对这种商品化的倾向加以抵制,追求艺术表现的生命本真的目的,艺术的价值批判意识对当今的消费社会仍有着参照意义。

三、跨文化语境中的中国 文学理论学科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颇热的中国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讨论如今已经逐渐冷却下来,但我

们面对的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更多的学者带着“冷却”后的冷静和反思重新应对问题,从热衷于“喊口号”到潜心于个案研究,从动辄建构体系到“添砖加瓦”、注重局部细节。本次会议强调在跨文化的语境中、视野下重新审视问题,取得了一定成果。

危磊教授(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带着批评的意识审视中国文论建设多年的发展,认为中国文艺理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有种强烈的认同。而事实上,不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和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论,还是中国传统文论,都只是建构具有当代形态中国文论的可资借鉴的参照系,这是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必然选择。认识中国文艺理论学界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论的接受、借鉴和整合,对跨文化视野中的当代文论建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他主张在建构具有中国当代特色的文学理论的问题上,有必要对西方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文论,进行“批判与创造”相统一的全新的审视与思想原创。

陆环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指出,在产业化时代,当被称为“无形文化遗产(遗产)”的文学以文化资源的身份参与到城市文化产业的运作中时,遂衍生出值得关注和研究的“后文学产业链”这一文化现象。她从“梁祝”产业、“姑苏”文化等新鲜典型的个案解剖入手,概括出这一文化现象形成的过程,提出走向当代价值实现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首先,参与产业开发的文学文本必须富有“意义含量”,并经由市场创意开发出“文本卖点”。其次,这些原创性文本必须具备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丰富的民俗学价值,其文本发源地已形成或正在形成地域性的文化场。再次,这些作为无形文化资源的原创文本必须有方便的物化手段和物化途径。她还以较为宏观的眼光审视了“后文学产业链”的三级资源化过程,以及被资源化之后,传统文学活动中的作家、作品、读者三大要素的地位和功能的蜕变。

王杰副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认为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在创新的驱动力之下某种程度地走入了新的思维误区,造成了文学批评实践失

语的尴尬,如以炮制新概念为能事,在文论译介上“食西不化”,知识总量的膨胀和批评效能的走低形成对比。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有:为了创新而创新,盲目追求大综合,故弄玄虚求复杂,热衷知识大生产等等。为走出这种困境,必须面对以下的工作:在中西诗学会通的基础上回到文学面对的人类基本问题;在人类诗性智慧的基础上回到文学原初的基本美学立场;在民族文化本位的基础上回到文学话语的当下生存现实。

向卫国副教授(茂名学院中文系)认为文学理论应以“文学”为中心,指出现行的文学理论课程体系对文学本质的理解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从而限制了《文学理论》课程体系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什么是文学”的理解上存在两大误区:把“文学”定义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构成部门;把“文学”的本质定义为“审美”。对于第一个误区,他主张通过摆正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恢复文学的本来地位。对于后一个误区,他指出审美是文学的功能之一,但不是文学的本质。因此,他试着重新给文学一个定义:文学是世界的想象性文本。

董馨副教授(佛山大学中文系)也从基本概念出发,指出文学理论中对“文学性”内涵的界定大体存在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两种基本倾向。普遍主义者持守本质主义的立场,认为“文学性”是文学的本质特性,是使文学成为文学的核心和标志;历史主义者力主反本质主义的观念,不仅认为“文学性”因“文学”的定义、文学的边界随时代变迁而显得极为复杂和不确定,而且确认“文学性”已经弥漫到学术理论、媒体信息、日常生活等各领域之中。无论是普遍主义意义上的“文学性”还是历史主义观念中的“文学性”,不仅学术理论、媒体信息等领域所弥漫的“文学性”而且文学中的“文学性”都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效应。主要体现在:审美效果遮蔽现实矛盾、本质追问预设普遍法则、文学惯例彰显统治地位。对“文学性”的意识形态效应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在今天图像文化君临人类文化生活的一切方面时,合理摆放文学的位置,正确看待文学的价值,适时规范文论研究的向度。

四、比较文学研究的崭新 拓展及未来趋向

经过若干年来的辛勤垦拓,广东比较文学界已取得累累硕果。尽管如此,许多学者认为在新的文化形势下,这一领域有许多新的拓展空间,对于比较文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与会者提出了不同的思考。

刘介民教授(广州大学中文系)认为比较文学的最终目的是在通过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找出他们的共性和差异,从而确定人类共同的美学原理和基本规律。学术界较多关于比较文学原理、方法等方面的一般理论探讨,较少有分量的个案研究分析。他肯定了乐黛云教授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在这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五四”以来中西文化沟通卓有贡献的十位名家进行研究,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语境中系统阐述他们的生活、理想、事业和成就以及对中外学术发展的贡献。丛书转向对“具体个案”进行研究,体现了他们对“一专带博”的治学方法的尝试。比较文学的研究原理和方法与“发皇古义,融为新知”有颇为相似的一面。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加以开拓,将具有启发作用。

陈涵平副教授(广东教育学院中文系)探讨了间性理论和比较文学的关系。指出间性理论包括主体间性、文本间性、文化间性三个层次。间性理论强化了比较文学的对话性:“间”有居中间、保持距离、平等、兼容之意,比较文学引入间性理论更有利于对话;间性理论拓展了比较文学的理论边界,丰富了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方法和内涵;总的来说,间性理论在比较文学中是富于生命力的。

陈希副教授(中山大学中文系)认为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很大一部分是作比较文学的研究。因为现代文学是受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国现代比较文学的研究存在主体被遮蔽的问题。普遍来说比较文学有一种趋同倾向,就是寻找共同的“诗心”;他指出更应当从

“异”的角度来考察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学自己的特点和主体性;认为差异是一种自我的存在方式,我们更需要从差异中发现“自我”;主张借鉴法国的接受理论来进行一种强调主体性的比较研究。

理论的建构固然重要,个案的研究无疑可以验证和丰富理论。部分学者结合个案分析深入阐明自己的观点。

杨挺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以“奥尼尔与叔本华”为例,指出叔本华是对奥尼尔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他详述了叔本华的生命意志理论、反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和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对奥尼尔的创作、哲学和美学思想都产生直接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最突出地表现在奥尼尔对爱情的诠释,对物质主义的深恶痛绝,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持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以及奥尼尔的悲观主义思想等几个方面。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深受印度哲学关于涅槃和虚无思想影响。奥尼尔的悲观主义思想也和印度哲学有很深的渊源。这并非巧合。在奥尼尔向东方寻求精神出路和灵感的历程中,叔本华正是他的重要引导者之一。

张卫东讲师(汕头大学文学院)以宇文所安为例,指出宇文所安一系列著作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突显了海外学者与国内学者在文学研究之基本信念、方法和视野上的巨大差异。其著作《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将文学文本的解读方法运用于中国文论研究,通过文本的细读建立起大量清晰的命题,揭示出中国文论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突破了传统的中国文论研究模式。尤其是对《文心雕龙》、《文赋》、《二十四诗品》等经典文本的解读,深刻阐述了文体对于中国文论的影响。宇文所安这种“内部”研究和“抽象”研究相结合的阐释模式,以及不断将文本的意义加以命题化的理论选择,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预示了汉语诗学的发展方向。

五、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在文化多元性存在的今天,文化批评与文

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热用”似乎成为必然。然而作为一种批评和研究的方法,“热用”背后自然少不了“冷处理”。与会者不仅对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作了个别概念的澄清,对它的地位给予客观的评价,也在各种具体问题上展示了新的尝试。

陶原珂编审(《学术研究》杂志社)认为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之间并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的关系。他从作为文学批评方法的文化批评、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文学批评、指向文学内涵的文化批评和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融合这四个层面阐述了这种相互交叉关系。

燕世超副教授(汕头大学中文系)认为文化批评拓宽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尤其对于文学本体中的文化内容有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具有独特的影响和价值。但文化批评是泛社会化的批评的变形,它没有批评的重点,也没有自身独特的理论建树和批评标准;它所带来的是艺术形式本身被漠视和美学批评的缺失;另外,它还导致批评主体思辨能力的萎缩,使文化批评本身变得肤浅。这是一种按图索骥式的批评,也是今天批评疲软的重要原因。

刘晓春副教授(暨南大学中文系)探讨了进化论、民族志、结构主义以及回归本土的人类学研究等范式的文化批评传统。指出人类学研究在“异域/本土”之间的跨越或回归,人类学家具有一种宏阔的跨文化视野,发现了世界上存在着丰富多样的文化生态,与此同时,西方人通过异文化反思自身,认识到自身文明的诸多缺陷。

仲红卫副教授(韶关学院中文系)指出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逐步分离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走向。市民文化是新市民阶层价值取向和情感方式在各种精神领域内的感性表达,它特别表现在市民对特定生活方式的追求和选择中,“情调”和“品味”是这种追求、选择的核心范畴——这就是弥漫在我们周围的消费时代的文化。他认为现阶段市民文化对中国

社会仍是一种解放性的精神力量。

赵志军副教授(湛江师范学院中文系)以冯梦龙的《夹竹桃》作为化雅为俗的范例,引出“变雅为俗”这一在文学史较为少见的演变方式,并阐述了“化雅为俗”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及其发生的深层原因:在人类的历史上,每一种文化都只是选择人性的某一方面作为自己文化价值和理想的基础,从而使人类失去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这就导致人类的主导文化日益僵化,失去活力而不得不重新调整 and 选择发展方向,人类就不得不重新回到人类的生物性,试图从其潜在的可能性中发现新的发展可能性。

傅明根讲师(广东商学院)十分关注消费时代的图像消费。他结合贾樟柯新近推出的影片《世界》,指出该文本特有的影像叙事符码——“缩微模型”、“拟像”、“舞台”,人物形象符码——“男人”、“女人”、“乌托邦欲望”的方式“复制”着“世界图像”。电影在对现实的、物质性“世界”和历史的、精神性“世界”进行一种建构/表征的同时,又实际上对以上“世界”进行了一番解构,由此成为一部对“世界”加以表征的经典文本。

本次学术研讨会会期虽短,但成果颇丰。正如蒋述卓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所指出的,这次会议展现了不同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体现了较高的学术质量,每个与会者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注重理论和文本、实践的结合。会议创造了一个老中青学者相互对话、多学科交织互动的良好局面,展示了广东学术界的实力与潜力。这次会议还显示出广东学术的实力提升比较快,这是由于青年学者经常参加外地的学术会议,开阔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克服了以前学术研究中浮躁等不良风气,而注重回归到学术,越来越注重学术质量。相信在这种氛围中,广东学术研究必将取得更多的成绩。

[责任编辑 吴奕琦]